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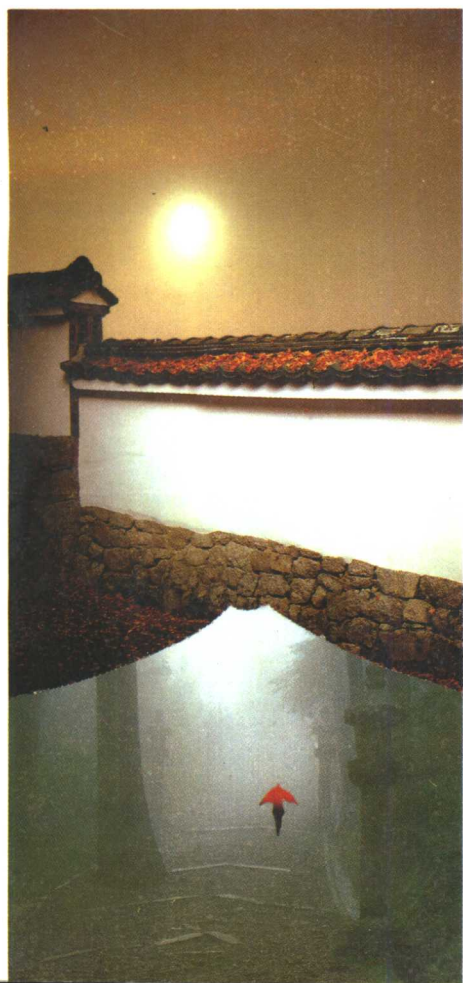
〔日〕伊藤虎丸 著

鲁迅、

创造社与

日本文学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
〔日〕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2

ISBN 7-301-02691-9

I．鲁… II．①伊…②孙… III．①鲁迅-研究②创造社-研究③比较文学-中国、日本 IV．I206

书 名：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著作责任者：〔日〕伊藤虎丸

责任编辑：王春茂

标准书号：ISBN 7-301-02691-9/1·34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5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80千字

1995年2月第一版 199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册

定 价：13.50元

思考历史： 日本一代有良知学者的灵魂

——序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孙玉石

同伊藤虎丸先生最初认识，是1983年春天。四月初，日本樱花烂漫的季节，我应邀到东京大学任教。刚刚过了两周之后不久，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文学哲学研究会邀请我作一个学术讲演。我讲的题目是《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再认识》。那天来了很多的日本朋友。伊藤先生就是专门从他小金井市很远的家里前来参加者之一。而且是年长于我的一位我所早已熟知的日本鲁迅研究学者。由于我的讲演过长，剥夺了与会者讨论的时间，我没有听到伊藤先生的批评意见。但在会后日本式的晚宴中，伊藤先生坐在我的身边，有时用困难的汉语，有时是由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的德永淳子女士当翻译，我们似乎谈了许多许多，关

于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关于郭沫若与创造社,关于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真正的交流……。至今,我能记得的,就是他多次说:“我对于你思考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很感兴趣。”这之后,我收到了他馈赠的刚刚出版的《鲁迅与日本人》一书,我才清楚,在这方面的研究,伊藤先生已经早我多年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我实际上应是伊藤先生的学生。而且,就思路的开阔新颖和研究的社会历史感与责任感方面,伊藤先生的思考,是为我所远远不及的。

后来,伊藤先生邀请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刘柏青先生到他任教的东京女子大学访问,并召开了一个有几十位学者教授和研究生参加的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了。会后,第一次到伊藤先生家里作客。先生宽敞的客厅里,挤满了友人。先生和夫人为了招待客人,在园子里给大家作烤肉,特别挖掉了花园里的一些树木,铺上了一大片新的碧绿的草皮。草皮还按先生的意愿,铺了一片小汽车的形状。这大约是为了表示对于客人欢迎的盛情吧。先生对我说:“我的男孩子,一直要我给他买一辆摩托车,我始终没有同意。这次他说,爸爸买了一辆草的汽车,为什么不买真的汽车?”我看着地上草皮的绿色的汽车形状,想着他的幽默而却是真实的谈话,先生对待中国朋友的真诚而深厚的感情,我是切实感觉到了的。

以后,我们的来往多起来了,友情和了解也随之加深。与先生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其他会议,先生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应北京大学邀请,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作的讲演,后来我到日本参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会上先生发表的讲话,我都是熟悉的。但是,先生在中国发表的许多文章,我却没有很好地

系统读过。这是我一直深以为憾的。

去年，先生以66岁的高龄，不辞辛劳，带领东京女子大学的学生，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参加“汉语和中华文化短训班”，还特别要我们给他们的学生额外安排一个活动：参观芦沟桥和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亲自带学生前往。看完纪念馆，他流泪了，很多学生也流泪了。我理解先生的心意。

伊藤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正如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竹内实先生1980年出的一本书的书名说的那样，是“友好容易理解难”。我们这一代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理解起来好做一些；可是下一代的日本青年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中国与日本经济与生活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日本的年青人对于过去的历史，了解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关心了。这是他最为担心的事。他总想尽自己的努力，让她们来中国看看，让她们了解历史，让正确的看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为伊藤先生的这种精神和思想所感动。他的学术著作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和思想。

正因为这样，一件我十分担心我所不能胜任的工作，是为我所不能推辞的。

也是去年在北京，伊藤先生向我说了他的一个意愿：将他这些年来在中国各种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学术文章，其中也包括他在日本出版的研究著作中的部分章节的中文译本，他的一些被译成中文发表的学术论文，结集起来，起名为《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准备在中国出版。这些论文，主要是有关研究鲁迅及其与日本明治时期哲学思潮之关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研究创造社和郭沫若、郁达夫，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文学关系等方面的论文。为了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我衷心希望先生的意愿能够尽早实现。出于友情和理解吧,伊藤先生并问起我:“先生能不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这时候,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但我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先生回国以后,便动手做这件工作。现在,书稿已经由友人转来,在我手里放了两个多月了。因为忙于杂务,也因为不敢轻易动笔,一直拖到今天。据悉,伊藤先生不辞辛劳,又要为东京女子大学学生的短训班之事,再一次来北京。这时,我才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开始认真地读这本书,这本在我看来是凝结着中日两国学者、人民的深厚友情和作者的深刻思考的书稿了。

读完之后,伊藤先生的思考激起我悠长的思绪。作为一名学生,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些话,算作一篇学习的心得,权当个拉拉杂杂的不像序的“序”吧。

二

日本战败之后,生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批有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对于过去一段历史的民族性的深刻反省。

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日本对于中国和亚洲的大规模侵略和所犯下的罪行,难道仅仅用当权的军界和政界的少数的法西斯分子的过错这样的说法所能解释得了的吗?日本的知识界和整个的日本民族在这场巨大的罪恶行动中是不是也负有什么责任?从整个文化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民族性方面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由此类的思考为主要契机,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界也形成了一种有强烈自觉反省意识的思潮。

这一学术思潮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至今为日本学术界所普遍尊敬的竹内好先生。竹内好先生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追求和完整理论体系的学者。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于鲁迅的研究，在日本的学术界，产生了笼罩一个时代的深刻影响。伊藤虎九先生，就是深受竹内好的影响而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的。或者也可以更准确地说，伊藤先生所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以及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与竹内好先生的学术思想影响分不开的。这样，伊藤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就清晰地贯穿了一种精神：一个具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感和反省意识所构成的主体精神的自觉。

这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得到了体现。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以致于在关于中国近代、现代文学的分期的一篇报告《亚洲的“近代”与“现代”》这样看来是纯属学术的文章里，他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

伊藤先生在多次阐述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产生过极大影响的竹内好先生发表于50年代初的一本论著《现代中国论》的时候就说到，这一本书，其实也是《现代日本论》，至今仍然有许多可以继承的观点。如书中就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所写的“近代是什么”一部分里面说：“东方的近代是西方强制的结果，或者不得不承认是从这结果导出来的。”“通过抵抗东方使自己近代化了。抵抗的历史是近代化的历史，不存在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西

欧在通过东方的抵抗,把东方纳入世界史的过程之中,承认了自己的胜利。西方把这个胜利看作是文化、民族、生产力的优越。”“在同一过程中,东方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失败是抵抗的结果。没有不经过抵抗的失败。而抵抗的持续则是失败感的持续。西欧每前进一步,东方则后退一步。”“失败在失败感中被自觉,其间有某个过程,抵抗之持续乃其条件……失败一次之事实与自己在失败中的自觉,并不直接相连。还不如说,因为失败往往是把自已导向忘却失败,再一次败于自己。失败感的自觉,是通过对于这样的再次性‘自己败于自己的失败’的再次的抗拒而产生的。在这里,抵抗成为双重的。对失败的抵抗,与同时对于不承认失败的抵抗,或者说对于忘却失败的抵抗。对理性的抵抗,与同时对于不承认理性的胜利的抵抗。理性的胜利,不承认是不行的,但这唯有通过双重的抵抗才能被承认。”伊藤先生对此解释说,所谓对于失败的抵抗,就是“反帝”;所谓对于不承认失败的抵抗,就是“反封建”。日本对于西方的抵抗就是接受西方的物质和武力,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抵抗,却在物质之外寻求一种有强大意志的人的精神,即“精神界之战士”的觉醒。日本是有进步性的,所以免于悲惨,但堕落了。中国是很保守的,所以陷入悲惨,但免于堕落。这种差异,用伊藤先生所接受的他的先驱者的话来表述他自己的观点时所说的话就是:

竹内称为“抵抗”的东西,丸山真男称为“对质”(不是单纯的反对)。缺乏对质的“某种领会之妙”,“使得任何东西都不加传统化”,这是日本思想(“杂居文化”)的特征。竹内称中国近代为以“抵抗”为媒介的“回心型”,称日本近代为“天

媒介”之“转向型”。我认为，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两位先辈对日本近代化之“反省”是一致的。而今日的论者把曾为两位先生“反省”过的“自己的短处”反过来，鼓吹为恰恰是支撑高度经济成长的日本文化的长处，这种说法实在令我感到不安和疑虑。^①

这里所表述的伊藤先生对于竹内先生等民族文化“反省”思想的接受和运用，有着怎样的明确性和一贯性。他在此书的不少篇文章中，用很多的文字探讨鲁迅作为一个最清醒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代 表，如何在接受西方冲击时所坚持的反物质而重精神的特征，将中国的命运寄托于真正的具有反抗精神和坚韧品格的“真的人”的身上。而鲁迅又是如何的反对“兽性的爱国主义”，同尼采等思想所包含或由其内在因素必然推导出来的恃强以凌弱的侵略思想划清了界线。他在谈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讲的“吃人的历史”和《呐喊·自序》中关于打破“铁屋子”的呼声时体现了这样一种西方学者的历史观：“大概这也说明鲁迅接受了‘自然之中没有历史’，而唯有‘真的人’才有历史（或曰发展精神）。”他将鲁迅的这一思想与日本北村透谷（1868—1894）的《内部生命论》中的思想进行比较。北村在1893年出版的这一本书中说：“造化支配人类，然人类也支配造化。人类所拥有的自由精神不愿默从造化……”先觉的知识分子们都渴望人类能战胜自然与社会的束缚而获得更大精神的自由。作了比较之后，伊藤先生说出了他的一个关注民族命运和坚持“反省”精神的深层的

① 见本书《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意识：“鲁迅和北村透谷等人的这些话显示了在东方开始接触西方文明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对祖国命运抱有敏锐危机感的年轻的灵魂。通过西洋近代文学而共同接受到的所谓‘西方有而东方没有的东西’（福泽谕吉）到底是什么。创造‘历史’的前提首先必须要有这种现今东方还没有的‘内部生命’、‘精神’、‘自由’等。”^①

在为他的《鲁迅与日本人》一书的中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中，他回顾日本鲁迅研究的三种鲁迅形象：小田狱夫的《鲁迅传》中的反抗政府的爱国者、民主主义的鲁迅；“奠定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石”的竹内好先生提出的“虚无的（绝望的）文学者”的鲁迅形象；战后60年代在当时关于“政治与文学革命”论争中，丸山昇先生提出的始终为一个“革命者”的鲁迅形象。伊藤先生从他的深切现实感出发，体味到这些鲁迅形象的提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都有着他们要争论的思想上的问题，这些鲁迅形象，都是他们对于社会思潮的主张或抵抗的表现吧”。然后，伊藤先生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在他的书里坚持采取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

在此书里，我是承认了上述鲁迅形象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几点看法。例如，在研究的根本态度上，我继承了上述研究家们对于过去的日本所进行的亚洲侵略的自我反省的态度；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则吸收了竹内好先

^① 见本书《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生的“文化”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①

作为在战争时期还是青少年的日本一代人民来说，他们对于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罪行，是没有任何责任的。重要的是承认历史，而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引起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思，就不仅仅是学术界应有的努力。由 50 年代的竹内好先生开始，到伊藤先生 90 年代还在继续的研究道路，体现了这一历史性的要求。这种“反省态度”和文化的“比较”的方法，是战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条坚实的路。伊藤虎丸先生、丸山昇先生、尾上兼英先生、木山英雄先生，继承他们的前辈学者竹内好所开辟的精神方向，努力通过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研究，特别是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民族性的长期关注和深刻思考的研究，在一些富于启示性的结果里，试图找到一条日本民族精神“内省”，从而走上真正的个性获得发展，民主主义得到真正实现的道路。这种远非纯学术而又充满了最严肃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体现了一个特定处境的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深厚的现实感和改造社会的自觉意识。

我读伊藤先生的这本书，首先为他这种一代日本“研究家们对于过去日本所进行的亚洲侵略的自我反省的态度”所感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精神在一些青年一代的研究者的身上，越来越淡化了，以致完全消失。这在学术研究的发展上或是一种进步，但也不能不说是老一代学人具有的精神品格一种令人遗憾

^① 见本书《致中国学者——〈鲁迅与日本人〉中译本后序》。伊藤虎丸先生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朝日新闻社，1983 年 4 月。

的失落。而在鲁迅和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中，伊藤先生几十年恪守不渝，至今仍然坚持这种“态度”，对此，我就不能不在这里表示我出自内心的敬佩之意。

三

在伊藤虎九先生的这些论文中，我感到的另一个突出的思想，是他对于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两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应有的民族个性问题的思考。这一思考，同样表现了他从竹内好先生那里继承来的一种富有自己思想的东方学者所具有的研究姿态：在东西文化交汇的视点中观察民族文化的重建时拥有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

他在思考文学史的改写与再研究的时候，很明确地提出一个思想，即写文学史应该以发现一个民族的自我个性为目的。他曾经这样说明自己的思想：

总之，我认为，书写文学史这项工作必须抱着去发现自我（民族）的个性这一目的。这里，我所讲的“自我（民族）之个性”，就是日本、中国的固有文化。如竹内所说，“自我之个性之发现”。首先必须是“精神（不是实体）”之发现。所谓“固有文化”，必须是唯有通过“不愿改变自己（这不光是精华，而且包括糟粕）的意志”，即“抵抗”这一精神的持续作用，而达到的新的自觉和创造。不经过这一“抵抗”，就不得成为“自我”。书写近代文学历史，不仅仅是发现西欧精神之扩张和东方精神“抵抗”的历史，而且是找寻“新的东西”在

东方诞生的过程。^①

“发现民族自我个性”为研究文学史目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思想，其来源仍然是竹内好先生所提倡的而为伊藤先生所不断阐发的这一思路：研究东西文化的近代化过程中所一直坚持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这个思想与西欧中心论的立场和观点完全不同，是东方文化近代化研究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拥有。这种主体精神，用竹内好先生的一句著名的判断就是：“东方的近代化是西欧强制的结果。”（《中国现代论》）伊藤先生说，近代化既然是外来的，不是自生的，那么，在这里就有对自己的错觉。如一些日本人不认为日本也属于“东方”。但是，如果坚持东方民族的主体性的观念，问题就很明白了。诚然如伊藤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所说的：“其实，可以说，把亚洲的近代化看作是被近代化，这才是主体性的态度。在中国，视鸦片战争之后为‘近代’，视五四运动之后为‘现代’，并加以区别，这大概源于运用历史唯物论，但恐怕还包括一个必须考虑的上述的与亚洲主体性有关的态度问题吧？而我的观点是：日本也是亚洲、‘东方’的一部分。”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清楚地阐明自己所理解的竹内先生的这一研究中国和日本文学的重要观点。他说，日本常有人把近代文学和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分开。而伊藤先生认为，近代的文学跟古代的文学之不同，就在于产生他们的“精神不一样”。所有的近代化，包括文学、道德、科学在内，“都是同一精神产物而不能分开”。共同的地方是：所有亚洲的近代文化，是同样的接受了

① 见本书《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西方的冲击”(Western Impact)而形成起来的。所以亚洲的近代化是“被”近代化;亚洲各国的近代化,同是西方近代文化侵入的结果。换句话说,“亚洲各国、各民族的近代或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各国家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所采取的——一面抵抗、一面接受——的态度不同而形成的。我们从这里应该看出各个民族文化上的‘个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差异只简单地看成一个先进一个是落后的——就是说,用一种和西方文化接近距离的远近来计测它们近代的程度是不妥当的。”伊藤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我想,站在这样的立场,才可能沟通亚洲各个民族之间的真正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道路。”^①

这种亚洲近代文化中“民族自我个性”的寻求,既反映了日本战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文化反省”的内在动因作用的结果,也更表明日本的一些学者在自身的理论思考中对于自己“被”西方近代化的趋势的一种“抵抗”的深潜的心理要求。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至于被西方文化的“入侵”所淹没,必须在一面接受一面抵抗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个性”。几乎可以说,这不是一个东方学者特别具有的自尊所推出的感情色彩很浓的结论,而是浸透了他们对于民族历史道路的整体性的充满了深厚责任感的理性的思考。

我们读这一本书,对于这一思考的深度和目的性的了解越深,就越会感到伊藤先生作为思想家型的学者所作的研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把这些文字仅仅看作是一种学究式的探讨,或忽

① 见本书《致中国读者——〈鲁迅与日本人〉中译本后序》。伊藤虎九先生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朝日新闻社出版,1983年4月。

略这一种精神和态度去读他对于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就会把自己的思想停留于表层而舍去了对于一种最为宝贵的精神成果的获得。当我们进入他的鲁迅研究的领域的思考的时候，才会真正把握他的一些看来是比较陌生的观点，而不会作出种种误读的阐释，把他的研究变纳入自我认知的模式之中，成为扭曲或任意解释鲁迅的证据。伊藤先生具有他进入鲁迅研究的独特的态度和视角，这正是他的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中日现代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灵魂。

伊藤先生已经年近七旬了。但他的精神和心理是年轻的。作为一个至诚的朋友，我可以借用伊藤先生在谈到鲁迅与北村透谷时写下的话，毫不夸张地说，伊藤先生多年执着的研究品格，显示了战后于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抱有敏锐危机感的年轻的灵魂”。

我们宝贵于他的探索的结果，但更宝贵于他拥有的这颗探索的灵魂。

四

进入伊藤先生对于鲁迅研究的“思考圈”，很容易地感到他以上述的态度和立场为核心所长期探讨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由于民族境遇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这些问题是近十年才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而伊藤先生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对这样的问题做着坚实的工作了。他的一些结论，至今不仅为他自己所坚持和作进一步的探讨，而且介绍和传播到中国之后，也已经在从陌生到逐渐理解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多中国同行学者们的认同。

这里我首先应该谈到的是,伊藤先生关于鲁迅“个”的问题的论述。

伊藤先生为了弄清楚鲁迅早期思想的来源及其对于中国和日本文化启蒙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花了很深的工夫去做了这样一件工作:考察与探讨尼采在日本最早的传播过程和不同的形象,鲁迅在日本明治时期对于尼采作了怎样独特的接受。这些研究成果,都已反映在本书所收的《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鲁迅和西方近代的相遇》以及附录的《明治三十年代文学与鲁迅》、《鲁迅如何理解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等文章中,这里就不再赘述。在这方面,我所尊敬的日本学者尾上兼英先生、北冈正子先生等人,都作了相当出色的研究。伊藤先生的特点是从思想史和比较文化的视角进入这一课题。其中我所最感兴趣的是,伊藤先生由这些考察和探讨的结果中所得出的关于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一些结论。

伊藤先生对于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有其独特的理解和把握。在这样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鲁迅的“个”的思想。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之“根底”在于它独有的“人”的观念。这表现为“人是被自觉为个”。这个“个”,“不是对于全体(集体)站在部分关系的东西”这些命题里的。所谓“西方近代文化”(包含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艺等等)形成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个”的独立,也就是从旧的“全体”(封建规范)的解放。其次是由这样获得独立(自由)的“个人”共同形成新的“全体”(新的秩序)的过程。而东方近代文化的形成过程,首先则是对于这样的西方近代文化精神渐渐加深认识的过程。其次是根据西方的“精神”重新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经过鸦片战争、太

平天国、洋务运动等，由开始的“船坚炮利”，经由中间的“议会制度”，到后来才进入对于“人”的“精神”的关注。严复译释《天演论》可以看作是这种转折的一个开端。此后鲁迅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则是这一思想在年轻知识界的意识自觉的代表。“在鲁迅的著作中，则达到了认识到西方文化的‘根底’，就是作为‘精神和个性’的‘人’的观念的阶段。而以后的中国新文学所走的道路，就是根据这样‘人’的观念，一方面暴露旧文化的‘非人性’，一方面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的过程。”^①

在这之前，伊藤先生在《关于鲁迅对于尼采思想的接受》、《关于鲁迅早期欧洲思想》等一些论文中，已经全面地论述了这一观点。^② 后来，在发表于中国的《文学评论》的长篇论文里，伊藤先生进一步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多年里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思考和研究。

他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是承袭竹内先生的“把鲁迅置于跟我们日本近代文学具有同时代性的位置来考察”。他在文章中说，自己是在吸收日本十分杰出的鲁迅研究学者木山英雄先生的出色的评论^③的基础上，试图更进一步探讨关于西欧的普遍的价值的影响，与中国民族的个性（民族传统）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鲁迅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主张的核心，是尼采的“个人主义”思想。而这个时期的鲁迅

① 见本书《致中国读者——〈鲁迅与日本人〉中译本后序》。伊藤先生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朝日新闻社出版，1983年4月。

② 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形成》，日本龙溪书舍出版，1975年10月。

③ 木山英雄《庄周韩非之毒》，《一桥论丛》第69卷第4号，1973年1月。